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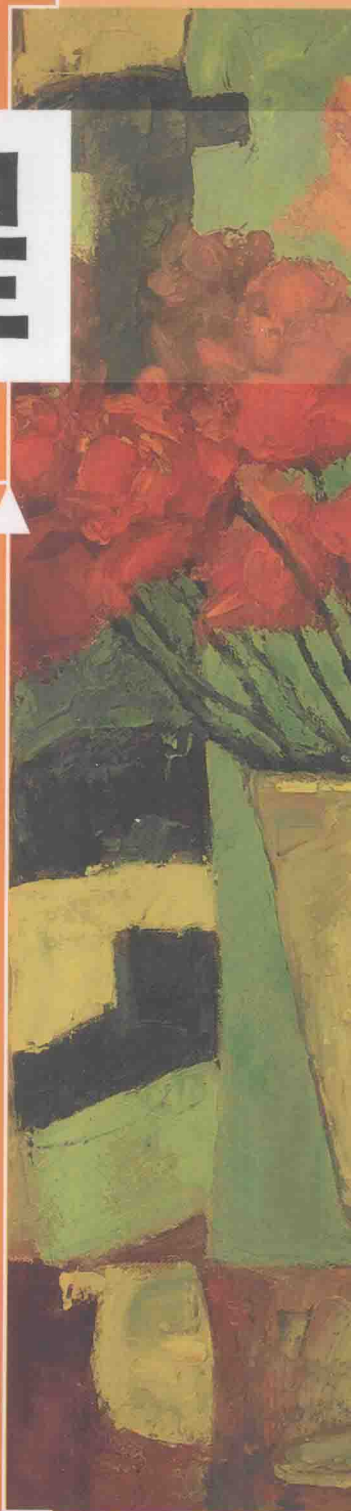


世纪中国语言文学通用教材

写作学教程

(第四版)

主编 段轩如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1 世纪中国语言文学通用教材

写作学教程

第四版

主 编 段轩如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瑞桓 陈晓洁 秦朝森

夏 秀 高 玲 路冬梅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写作学教程/段轩如主编. —4 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5
21 世纪中国语言文学通用教材
ISBN 978-7-300-19269-7

I. ①写… II. ①段… III. ①汉语-写作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5407 号

21 世纪中国语言文学通用教材

写作学教程 (第四版)

主编 段轩如

Xiezuoxue Jiaoche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规 格	185 mm×260 mm 16 开本		2014 年 6 月第 4 版
印 张	19.25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96 000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第四版前言

《写作学教程》自2004年7月出版后,至今已走过了10个年头。10年来本教材受到全国许多高校广大师生的欢迎。本次修订再版是在广泛吸收广大教师在教材使用过程中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次修订调整了教材的结构,将原教材的上下编调整为上编(写作原理)、中编(文学类文体、新闻文体、议论文体的特点及写作)、下编(党政机关公文、事务文书的特点及写作),同时对教材内容做了增删,对个别词句或案例做了调整,使其在知识的传授、能力的训练上更加科学化。本次修订版删去了略显专业且不具使用广泛性的原第9章“财经文体”[该章节及本书教学大纲已放到网上,有需要的教师可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网站(www.crup.com.cn/rw)下载];在第5章“新闻文体”中增加了“网络新闻”一节;重写了第4章“文学类文体”中的“诗歌”一节;按照201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中办发〔2012〕14号)的要求,对党政机关公文写作的相关内容作了全面的调整和修订。

通用、适用、实用,是本教材的突出特点。经过10年的使用,本教材的使用范围不断延伸,既有高校本科专业,又有职业院校的专科专业;既有专业课,也有公共课;还被许多高校列为研究生的必读书目或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学习主要参考书目,成为网上热销图书。这都得益于广大读者的关心、支持。借此再版之际,我们对来自领导、前辈、同行和广大读者的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书中不足之处还望专家、同行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进一步完善。

主 编
2014年1月

第三版前言

本书是济南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编写的写作学教材,2004年7月初版。教材出版后受到很大欢迎,被全国许多高校作为本科生的专业用书,还被有的高校列入研究生的必读书目或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学习参考书目。

2005年本书经修订出版了第二版,增加了“写作主体的思维品质”一章,使全书体系更加完善。

教材在使用过程中,得到了教学一线的教师和专家们的积极评价,这次修订再版,我们吸收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删去了绪论中与写作关系不是很密切的文字,更换了比较陈旧的例文。在第一章“写作活动中的客体”中增加了“写作活动中的读者”一节,之所以这么做,是缘于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读者对于作品是存在期待的,这种期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读者希望看到那些接近自己的现实生活、表现形式新颖活泼的作品。另一方面,读者希望看到深刻的、能给人启迪、发人深省的作品。这就给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形式上,写作应该注意针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在内容上,写作应该关注现实生活,表现大多数读者的现实生存和思想状况,说出大多数读者想说而没有说出或说不出的话。

从写作角度来谈论读者,主要目的仍然在于探讨如何写出好的作品,简单地说,就是如何根据读者的需求写出好的、受读者欢迎的作品。因为从传播学意义上讲,写作是为读者而写,读者是作品效果的检验者。

经过四年的使用,本教材在广大读者的关心、支持下不断完善,成为网上热销图书。借此再版之际,我们对来自领导、前辈、同行和广大读者的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

主 编

2008年4月

第二版前言

《写作学教程》自出版后,在教学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得到了社会好评,随着社会对人才提出的新要求,结合我们的教学实践,我们对部分章节的内容做了进一步调整,增加了“写作主体的思维品质”一章。因为思维是智力和能力的核心,思维状态和思维品质决定着写作状态、文本品格。可以说,写作水平的高低、文章质量的优劣,从根本上讲是思维品质的差别使然。写作作为一种创造性极强、极富个性化的劳动,良好思维品质的养成极为重要。因此,写作主体优秀思维品质的养成,也是写作课的基本的任务之一。同时我们还增加了网络文本和申论的内容,以适应社会对网络传播交流和公务员备考的需要。

主 编

2005年7月18日

第一版前言

社会的需求,人类的实践,决定着写作的诞生和变迁。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交往的频繁,信息的便捷,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当今社会越来越离不开写作。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对人才要求的提高,写作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写作课教学的改革显得日益迫切。从社会需求的观点出发,立足现实,既要继承和借鉴以往写作学研究的成就,又要不断创新发展,以科学的态度探讨写作的规律,确立写作学的学术品位,构建行之有效的《写作学教程》的理论框架,力争为社会、为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提供一部高质量的新教材,是我们撰写这本教材的初衷和目标。

现有写作教材,虽说样本众多,但多数教材往往不同程度地存在缺憾。有的内容陈旧,与人才需求脱节,不利于实践型人才的培养;有的将写作学分作系列教材,条分缕析地加以阐述,看似非常全面、周到,但并不实用,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课程安排做支撑;有的写作理论体系紧步文艺理论发展的后尘,新名词、新术语层出不穷,看似焕然一新,但实质上将写作归入文艺学范畴,丧失了写作学科独立存在的地位……

与同类写作教材相比,《写作学教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注重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本教材的编写注意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理论框架,二是教材涵盖的内容。就前者而言,我们试图克服以往教材对写作(活动)研究的局限,从更为全面的角度把握其规律特征。过去的写作研究将文本分作“内容”与“形式”两大方面,然后又将“内容”分作材料(或题材)、主题,将“形式”分作结构(布局)、表达、体裁、语言等要素,这种方法多注意对各个要素与部分的讲解,但这只是分解的、静态的探讨,没有将各个部分再进行综合,在动态中把握写作活动的规律,因此难以真正揭示其本质。我们认为,写作活动实际是主客体之间的双向动态的逆反建构过程,离开任何一方去探讨另一方都不能得到正确认识。在这里,我们既借鉴文艺理论的成果,又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凸显其实践品质。就第二个问题而言,通常写作课教学内容有两大方面:基础知识和文体写作。在现有的教材中,这两者往往是脱节的:或者只有基础知识部分,或者只有文体写作部分,不论哪种情况,都不利于写作课教学,不利于切实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若只讲基础知识部分,没有各种文体做实例,缺乏感性认识,所讲理论难以巩固,这就忽略了其学科实践性特点,只会“纸上谈兵”;

若只讲文体部分,没有写作的基本知识做支撑,只能是“缘木求鱼”,很难在根本上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鉴于此,我们的教材将二者有机结合,不仅涵盖写作学科的全部基础知识,还针对当前社会发展现状和汉语言文学专业特点,将文学类、公文类、事务文书类、经济文书类、新闻类等常用文体纳入其体系,使学科知识体系建构更趋于合理化、科学化。

二是知识的新颖性。这本教材的内容能紧密结合当前学术前沿动态和社会需求,使其知识保持相对新颖。不仅表现为学科的基础知识新,而且例文也尽量选用近年来发表的文章,使即将走出大学校门的学生以及广大读者在知识上不落伍。比如,针对近年来公务员招考以及“一推二考”选拔各级领导干部考试的内容,我们增加了“申论写作”;鉴于当前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快速普及,我们增加了“网络文本”的介绍。

三是体例的实用性。社会需求、人才培养的需求是我们编撰这本写作教材的出发点和归宿。写作,尤其是其中的应用文写作,从社会功用的角度说,强调的是实用。因此,我们在教材的撰写中注重了实用性特点,突出写作的规矩、方法和范例等,不仅详细讲解了各种文体的格式、写法,还在文后选引了近年来水平较高的例文。程序和规矩不是束缚人的条条框框,而是经验、章法,把握规律、章法是学好写作的必要条件和前提。方法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表现思想情感的工具。解释、论断、分析、说明,在不同的文种、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用法,表达不同的含义。范例不仅能给操作以具体、可感的示范模式,而且能给人一种可学可做的规范和途径。

本书不仅可以作为高等院校写作学科教学的教材,也是广大读者学习写作的良好参考资料,还可以有效地指导参加社会各类选拔性考试人员的备考。

主 编
2004年7月

目 录

上 编

绪 论	3
第 1 章 写作活动中的客体	8
第一节 文学写作活动中的客体	8
第二节 应用写作中的客体	12
第三节 写作活动中的读者	13
第四节 把握客体的途径	16
第 2 章 写作主体的思维品质	23
第一节 影响写作思维的基本要素	23
第二节 写作主体的思维品质	30
第三节 影响写作思维个性的非智力因素	43
第 3 章 写作活动的物化	50
第一节 文本的语言建构	50
第二节 文本的内在结构	60
第三节 文本的表达方式	68
第四节 网络文本	96

中 编

第 4 章 文学类文体	107
第一节 散文	107

	第二节 诗歌	117
	第三节 小说	124
	第四节 影视剧本	132
第 5 章	新闻文体	136
	第一节 新闻概述	136
	第二节 消息	139
	第三节 新闻评论	150
	第四节 广播电视新闻	155
	第五节 网络新闻	160
第 6 章	议论文体	164
	第一节 文艺批评	164
	第二节 思想评论	169
	第三节 学术论文	174
	第四节 杂文	177
	第五节 申论	183

下 编

第 7 章	党政机关公文	193
	第一节 党政机关公文概述	193
	第二节 党政机关公文的写作	218
第 8 章	事务文书	266
	第一节 计划	266
	第二节 总结	271
	第三节 简报	276
	第四节 会议记录	280
	第五节 调查报告	283
	第六节 演讲词	287
	第七节 电子公文	290
参考书目		293
第四版后记		294



上 编

绪 论

写作是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一定的物质水平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重要的精神生产活动。

关于写作的起源，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在他的《文选》中认为写作产生于传说中的伏羲之世：“式观元始，眇觐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① 这个论断现在看来是缺乏科学性的，但是他把画八卦、造书契作为写作产生的前提，把写作与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生产活动联系起来，这个思路无疑是正确的。关于写作的起源，鲁迅先生在他的《门外文谈》中有另外一种说法。他说：“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② 其中提到的巫的记事就是写作。鲁迅先生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写作的起源。总之，写作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文章是殷商时代的甲骨刻辞和铜器铭文。内容大多记录的是奴隶主贵族的占卜、祭祀、征战、狩猎等活动，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大抵属于后来所谓应用写作的范畴。以被认为“神州古籍，唯此为先”的《尚书》为例，鲁迅曾经指出其体例有六：“曰典，曰谟，曰训，曰诰，曰誓，曰命，是称六体。然其中有《禹贡》，颇似记，余则概为训下与告上之词，犹后世之诏令与奏议也。”^③ 可见，说早期的文章多为应用性文章是有道理的。从形式上讲，最初的文章都比较稚拙、简单，概括性很强。比如，甲骨文中“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样一节记载，用简单的八个字，概括了一次狩猎活动。从这些最早的文字中，我们大抵可以窥见早期写作的情形。

写作活动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而存在，与物质生产活动相比较，有其独特的特点和规律。从本质上讲，写作是主体借助一定工具对客观事物进行改造、加工，并进而生产出满足主体需要的精神产品的生产实践活动。美国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他的《镜与灯》中认为，一

① 转引自河南省写作研究会：《写作概要》，1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② 《鲁迅全集》，第6卷，8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③ 《鲁迅全集》，第9卷，35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般说来,艺术基本上包含了四个基本要素:世界、作者、作品、读者。作者首先要对特定的社会生活现象进行观察体验,搜集素材,然后再进行构思并表达出来,形成作品。因此,任何写作都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作者对世界不是仅仅进行简单的模仿,而是把客观世界和自己的内心活动进行复杂的“化合”,其中客观的物象和主观的体验相互交织,彼此作用。在这一点上,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的一段话读来令人颇有启发,他说:“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①在这段话中,郑板桥揭示了绘画乃至所有艺术复杂而充满了差异和变化的过程。画家反复强调,“眼中之竹”不同于“胸中之竹”,“胸中之竹”又不同于“手中之竹”。也就是说,艺术(包括写作)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充满变数的创造活动。它要经过物——意——文的双重转化。

至此,我们可以对写作做这样一个界定:写作是用书面语言形式进行的一种创造性的认识和书写活动,是一种行为的实践过程。具体地说,就是写作主体以文字为媒介,依据生活实践和社会客观事物,有目的地进行观察、选择、提炼、加工和改造,加以能动地反映,最后制作出精神产品——文本的实践活动。

写作学作为一门学科,主要的任务就是研究与写作有关的规律、技巧以及各种文体的特点、写作方法。其基本内容包括文学的本质论、作家论、写作过程论以及技巧论等。

我国对写作的理论研究源远流长,并在继承和发展中不断完善。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周秦时代的《尚书》、《周易》、《论语》等儒家经典著作以及诸子百家著作中就已经有了许多关于写作的论述。比如《尚书》中的“诗言志”、“辞尚体要”,《周易》中的“情见乎辞”、“修辞立其诚”,《论语》中的“辞达而已”、“文质彬彬”、“思无邪”,《孟子》中的“知言养气”、“知人论世”等命题。这些论述不仅对古代写作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现在的写作学研究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文章的本质和规律的研究,对作家和作品的分析,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等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写作学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品格。南朝齐梁之际刘勰的《文心雕龙》,全面透彻、精辟细致地论述了创作中的想象、形象思维、构思布局、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以及作家的个性和文章的风格的关系等,使中国古代写作理论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范畴体系。自唐代以后,写作学研究随着一系列重大的文学运动获得了重大发展。在唐代,文学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写作理论也颇有建树,主要表现在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和鉴赏的美学规律,还通过批判六朝绮靡的文风,创立了中国的古文理论。尤其是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使传统的美学原则以及现实主义诗文理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韩愈的“文以载道”的观点,在强调作家的主观道德修养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宋代的古文运动继承和发展了唐代古文运动的有关精神,并有了新的发展。明清时代,李贽的《童心说》以及他的小说、戏曲理论,金圣叹、脂砚斋等的小说评点,李渔的戏曲理论,还有王夫之、叶燮等的诗论一起把我国的写作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进入20世纪,关于写作的研究有了更多的成果,比较有影响的有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叶圣陶的《作文论》、郭绍虞的《学文示例》和唐弢的《文章修养》等。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写作的教学研究得到不断深化,出版了一系列论著和教材,比如马正平编著的《高等写作学教程系列》、邱飞廉的《实用文秘应用文写作大全》等都是颇有成绩的。

① 郑板桥:《题画》,转引自周宪:《美学是什么》,11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写作学与文艺学、文章学等学科有密切的联系但又有明显的区别。文艺学主要研究与文艺有关的各种现象,其研究对象是各种文艺现象而不包括一般文章的写作。在研究重点上,它着重理论探讨,而不重视对具体写作技法的研究。

文章学侧重于对一般文章进行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源流和发展、内部构造和读写规律等方面。在它的研究范围中,一般不包括各种文学作品。在研究的重点上,它一般也只侧重对文章成品的研究而不关心写作的过程。

值得深思的是,这几年写作学的研究、教学走入低谷,究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写作学至今为止尚未得到官方实际认可,全国高校的研究生学位授予目录中没有写作学科,导致高校写作教师队伍力量的相对薄弱,或者学历偏低,或者即使有相应高学历也是其他专业的博士、硕士;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研究生点又导致写作课的教师只能“另谋出路”,依靠、挂靠其他学科使自身专业得以发展,这又使对写作学的研究出现精力投入不足的状况。然而,现实社会的发展使写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写作成为走向社会实践层面的必备技能而备受社会的关注,不论是基础教育中的中考、高考,还是公务员招考和党政领导干部的提拔考试,都将写作能力的测试作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和环节。写作越发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如何使写作研究、教学走出“瓶颈”以适应当今社会发展对综合素质人才的要求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写作不仅是一切学科的基本功,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表述工具,而且还是培养学生素质的重要方式之一。现代写作活动是直接提高现代人文化素质的实践活动,写作活动的精神产品(文章)是作者多方面素质的综合体现,它不仅体现着作者的文字功底,而且涵盖了作者的道德修养、政治素质、知识素养、生活阅历、思维能力等多方面的素质。正因为此,余秋雨先生曾指出,写作是文化素质中的重要素质,是素质中的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写作应该是人的一项基本能力、基本素质,写作课就是一门基础课,其基本内容就是讲授与写作有关的方方面面的规律与法则。写作课的任务在于:

第一,让学生掌握具体的文体写作。这是写作课的中心任务,也就是通过系统的实践训练,使学生掌握各种比较常用的文体的写作方法和技巧,并根据专业的需要,掌握特定文体的写作,能够写出合乎要求的文章或文学作品来。

第二,培养学生的阅读、分析、鉴赏能力。写作课要指导学生阅读分析一定数量的范文,锻炼提高学生对文章进行分析、鉴赏和评论的能力,以便使其适应将来实际工作的多方面需要。

第三,总的教学目标是全面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进而达到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深入思考能力、清晰表达能力等的目的,全面开发学生的智能。

写作课是一门很有特点的课程。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技能性。写作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让学生掌握必要的文体的知识,从而能写作合乎要求的文章。这个任务以及写作课的基础课的性质决定了其技能性。

苏轼在谈到创作时说,任何创作都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者对所表现的事物的认识,另一方面是对已有的认识如何运用艺术方式把它充分地表达出来。这两个方面苏轼称之为“道”和“技”。这里的“技”就是“技艺”、“技能”。就“做文章”而言,写作确实属于一门“术科”,具有训练的技术性。

二是实践性。写作课主要讲授与写作有关的理论,而其任务却是提高写作能力。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主要依靠写作实践,也就是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在理论的指导下,有的放矢地训练。如果仅仅有理论学习,而没有具体的操作练习,理论只能是空头文章,达不到提高写作水平的目的。

三是综合性。写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活动。其综合性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它既是脑力劳动也是体力劳动;它既需要思想(知识)也需要技巧(技能),用苏轼的话说就是,既需要“道”,也需要“技”,用陆机的话来说就是既需要“知”也需要“能”。所谓的“道”和“知”,指的是对事物的认识,这需要人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需要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谓的“技”和“能”指的是人的表达能力,这涉及人的语言能力、逻辑能力等。因此,写作课虽然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但它与相关学科,如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逻辑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很强的综合性。

四是效果的滞后性。所谓效果滞后性是指写作课的效果不会立竿见影。因为学习写作理论最终是为了转化为实际的写作能力,而从接受理论到转化为实际的能力中间需要有一个过程,由知识转化为能力的滞后性决定了写作课效果的滞后性。同时,写作本身既需要记性,也需要悟性和灵性。写作课所解决的仅仅是记性,而悟性和灵性就需要课下慢慢获得了。

我国一向重视个人的写作能力,古代就不用说了,直到现在,在各级学校的升学考试的语文学科卷面上,作文分数占到总成绩的40%~50%,这就意味着,看一个人的语文综合能力如何,写作能力的比重约占其中的一半。但实际的写作教学状况却与此并不怎么相称。在解放以前,虽然有的学校也开设了写作课,但基本属于因人设课,既没有统一的教材,也没有教学大纲。新中国成立后的写作教学,大致走过了从汉语言文学到全学科,从文学创作到文秘、应用写作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交流的增多,大部分高校开设了写作课,但具体情况不尽相同,总起来看,30年间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普遍开设基础写作课;第二阶段是分化和各行其是,一部分学校取消了写作课,另一部分学校或仍然坚持上基础写作课或另辟蹊径,上秘书写作、文学写作之类的课程;第三阶段是以应用、实用文体为中心的注重实际写作能力培养与训练的教学阶段。

相较而言,文明程度越高,科学技术越发达的国家,人们对写作能力的要求似乎也就越高。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教育界流行的一句口号就是“学习通过写作”。最近,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法》一书中指出,由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有五件最重要的事情应该记住,其中之一就是在这个文字密集的社会里,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具体的写作技能。罗伯特·穆尔在他的《效果写作》中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语言是思考、表现、理解的主要手段,一个学生必须精通祖国语言。他还认为所有的美国大学在新生入学的时候把基础的作文法教程列为必修课程等措施是体现了对语言能力的重视。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与美国大致相同。日本的经理训练班结业考试,香港招聘职位都有动笔写作这一内容。显然,一个人如果不具备较强的写作能力,生活、工作都要受到一定的影响。

学习写作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修身养性,提高自身品格。东汉时期的文论家王充对一般文人进行了分类:儒生、通人、文人、鸿儒等。在这几类文人中,鸿儒为最优者。通过对鸿儒的赞扬,王充提出了品评作者的标准。他认为品评作者的高下不能仅仅以知识量为标准,而应当看他能否博能通用。东汉时期,社会充斥着各种各样死读书的儒生,一些人一辈子钻在故纸堆里,埋头和死人对话而不能活用知识。对于这样的人,王充认为他们不过是一些学舌鹦鹉,能够看草识木,却不能采草成药,不能伐木成梁。实际上,王充在这里提出了对作者的要求,就是既要有“才智”又要有“实诚”的品格。这里所说的“实诚”的品格就是指情感要真诚,心胸要坦荡。做文首先要有人品。法国文论家布丰说“风格即其人”,清代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中也说“诗品出于人品”。确实如此,写作者不仅仅是因为技艺而工作,在更大的层面上还与责任感、荣誉心以及

某种神圣的信念联系在一起。没有好的人品，委琐做人，虚伪为文，都将留下笑柄。

提高自身品格还必须努力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有个说法叫见多识广。见得多了，捕捉新事物、新现象的能力，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等都会有提高，这样在行文时就可能有新意，内容才可能丰富、深刻。否则的话，可能会捉襟见肘、张冠李戴，不仅文章内容贫乏，还有可能闹出笑话，轻则文章没意义没价值，重则流弊不小，贻害他人。

提高自身素质还要注意思维能力的训练。写作思维就是想方设法将已获得的认识成果借助一定的文章体式表达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带有独白的性质，但它并不是一种完全的独白，而是要让读者容易理解。这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思”，一个是“达”。前者指的是要想清楚，后者指的是要表述明白。两者都需要清晰的思维能力。思维混乱，不仅会影响对问题的深刻思考，而且还会影响表达。

二是多阅历，多读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有“阅世”的说法，实际上指的就是要多阅历，尤其是多体验。亲身经历和体验对一个人的写作影响是很大的。时代和经历会在作者的心理上留下深刻的印记，这也就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孟子说论文要“知人论世”的原因。阅历对写作的影响不仅涉及作品的内容，而且涉及作品的形式、风格等。比如诗人杜甫，因为他经历了唐代由盛而衰、安史之乱等颠沛流离的生活，亲历了动荡饥贫和失子之痛，所以他的作品，不仅多写现实人生，而且还形成了沉郁痛切的风格，他也被后人称为“诗圣”。

读书也是获取材料、见识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读书还可以借鉴写作方法，感悟写作规律。还有，读书可以开阔胸襟，陶冶性情。关于读书的作用，后面相关章节有专门论述。

三是多练。写作技巧需要经过日常习练，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获得。《庄子·达生》篇中有一个“佝偻者承蜩”的故事。孔子见一个驼背的人在抓蝉，一抓一个准，孔子非常奇怪，便前去请教。佝偻者说：“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镞铍；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对驼背的抓蝉者而言，身体就犹如一个抓蝉的机器，要成为这个机器，就必须经过艰苦的练习，最终使技巧内化到身体、精神中。写作与此类似，也需要长期艰苦的习练。这是由写作的技能性所决定的。

多写多练，要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一般地说，要遵循下列原则：由短到长再到简；由不规范到规范再到变化；由单一到多样再到专一。同时练习的形式要灵活多样。可以写日记，可以参加文学社团的活动，给报纸刊物投稿等，对各种各样的形式都要有意识地加以利用。多练还要持之以恒。写作不是朝夕可成的事情，所以不能急于求成。胜不骄，败不馁，坚持下去，才可有成效。